<https://www.amazon.co.jp/%E4%B8%AD%E5%9B%BD%E8%BF%91%E4%B8%96%E5%8F%B2-%E5%B2%A9%E6%B3%A2%E6%96%87%E5%BA%AB-%E5%86%85%E8%97%A4-%E6%B9%96%E5%8D%97/dp/4003811712>

其中，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（1866-1934）一方面沿用了西洋史学对“近世”的表述，另一方面又以中国史为研究对象，对其内涵作了革新。

【关于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，中译本可参照《中国史通论：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》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其中上册的三个文本（《中国上古史》，《中国中古的文化》和《中国近世史》）可以看到内藤湖南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对“近世”这一分期方法的具体处置。】

6

在其《中国上古史》的序言部分，内藤湖南将中国历史分为四个阶段：

上古：从中国文化的形成到东汉中叶。

（第一过渡期：东汉末期到西晋）

中世：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代中叶。

（第二过渡期：唐代末期到五代十国）

近世前期：宋元

近世后期：明清

此处，内藤湖南并未给出具体的分期标准。但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作了总结：

“通观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体面貌，它好像一棵从根部开始生长的树木，然后生出枝叶，形成了单一文化自然发展的系统，构成了宛如某种世界史一样的存在。”

也就是说，内藤湖南首先将中国历史的发展视作自足的整体，承认中国历史的特殊性。“近世中国”必须放诸中国历史自身的结构与运动规律之中考察。同时，对于西方历史分期话语的使用，说明内藤湖南试图将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史的体系中。进一步地，这种对话的努力使得以“近世”为中心，比较中国，日本，乃至欧洲历史的研究成为可能。

对日本汉诗史研究的启发在于：这里的比较，绝非以单纯的共时研究为方法——因为不同文明历史中的近世，乃暗示着全然不同的整体结构——而是为了展开对更多问题的想象：例如，近世日本汉诗是否有所谓“近世中国诗”的对应物？如果没有，是何种因素造成了对应的缺位？

《概括的唐宋时代观》一文中，内藤湖南充分比较了中世和作为近世开端的宋代之间的区别。简述如下：

政治上，中世以贵族政治为主，强调家族谱系，其地位有时甚至超过君主，而普通百姓几乎不接触政治；到了近世，贵族阶级没落，君主专制稳固。

影响到官员选拔。中世的九品中正和科举制度是贵族性质的，科举制度以帖括【？】和诗赋为主；近世的科举，则以实用性的策论为主，应试者也较中世大为增加。

经济上，近世较中世，货币经济更为发达。中世与近世的更替，是实物经济的终结和货币经济发达的开始。此外，近世以降，人民开始掌握财产，而非像近世那样被作为没有财产处置权的奴隶。

学术文艺方面，中世经学重视师法，近世对经学的阐释较为自由；中世文学革新既往文学的同时，也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范式，特别是诗歌；近世文学则以词，曲，剧等为主，发扬以俗语为特征的自由表现。

艺术上来说，近世的绘画较中世，其功能上不再强调作为建筑的附庸，而是画家表现心灵的媒介；近世的舞蹈较中世，更反映平民的趣味。

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到，内藤湖南对唐宋变革，或说中世与近世交替的分析，深入到了制度乃至文化的诸方面。而从中世到近世转化的过程中，存在着一个主要的方向，那就是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权的上升和加强。而这一点融贯于内藤湖南对西洋历史和日本历史的观察，成为其历史分期方法的重要标准：

“各个时代的划分方法中都有着与之相应的内容。譬如西洋的近世概指文艺复兴以后的时期,包括一般民众的力量是否增长;伴随着新土地的开发,经济上有何变化;社会组织是否出现变化等等内容。在日本,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主张在进行类似的时代划分时,以上述内容为基准较为妥当。”【转引自《内藤湖南的世界》，三秦出版社，2005年，138】

<https://dl.ndl.go.jp/info:ndljp/pid/1917956/112?tocOpened=1>